内陆政治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内陆实践的实证研究*

赵可金　　张泰伦

【内容摘要】　内陆地区如何突破区位限制并形成发展势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政治经济学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生产体系全面深度交融，内陆地区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效。本文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切入，提出以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为核心要素的内陆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的发展与开放战略作为实证案例。研究发现，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了防御型、追随型、进取型和开拓型四种内陆地区现代化战略。案例研究表明，内陆发展并非由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或国家政策单独决定，而是取决于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在不同时空的动态适配，生态条件制约发展高度，制度属性影响发展速度。中国内陆地区现代化应在优化生态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制度改革和加快制度型开放进程，探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

【关键词】　内陆地区　现代化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84）；张泰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2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6)05-0046-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60500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大变革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影响研究”（22JJD810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沿海、内陆与边疆的关系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一个协调的内陆与沿海开放布局，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如何统筹协调沿海、内陆与边疆的关系，确立与陆海复合型大国定位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一直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课题。工业革命以来，跨洋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和产业日益向沿海、沿边、沿江、沿路、沿港和沿城聚集，内陆原有的政治优先发展定位逐步被非内陆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定位取代，内陆与沿海的发展差距随之扩大，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战略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布局，推动外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加速聚集。[①] 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内陆地区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攸关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甚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为缩小中西部内陆与沿海的发展差距，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同时高度重视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建设。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进程中，加快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步伐，[②] 以区域协调推动全面开放，以全面开放引领统筹区域分工定位。实践表明，内陆发展不能简单复制沿海模式，需要依托开放大通道、打造大平台和建设大枢纽来推进高水平且业态多样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探索。作为没有被纳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国家战略的重庆，辖区

① 截至 2024 年 10 月，中国先后设立 229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23 年，国家级经开区以仅占全国约 3‰的面积，贡献了全国 10%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其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国比重均为约 25%，成为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主力军”。参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国家级经开区 40 年发展综述》，中国政府网，2024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1786.htm；邢灿：《改革创新四十载　国家级经开区再启新程》，《中国城市报》2024 年 10 月 28 日，第 3 版；《商务部公布 2024 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商务部网站，2025 年 1 月 3 日，https://www.mofcom.gov.cn/xwfb/rcxwfb/art/2025/art_db86a5a6bf404911bd5193602cfb0cd8.html。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新华网，2024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721/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c.html。

内西部陆海新通道获批上升为国家战略，[①] 使其成为带动重庆及辐射内陆地区沿线发展、深化区域开放和完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重要引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陆实践样本。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内陆地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总结仍显不足。因此，本文以生态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内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陆地区实践的理论研究。

一、内陆发展的既有解释视角及其限度

学界关于一个国家内陆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资源约束相似或不同的内陆地区为何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为何在不同时期发生转型等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地理学、地缘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视角，分别强调空间区位与产业聚集、国家战略与国家作用、资源依赖及其增长效应。这些解释普遍局限在由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框架内，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所造成的生态体系变化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

（一）经济地理学视角：区位、聚集与空间分异

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空间区位角度切入，分析经济活动的非均匀分布及其影响。内陆地区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成本和规模经济因素造成的“报酬递增机制”，经济增长会促使一些有优势的部门和地区出现。

在经济地理学中，以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区位经济学等为代表的研究，均强调经济地域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增长首先集中于特定增长极，通过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差异化影响。[②] “核心—边缘”模式

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9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ndrc.gov.cn/fggz/zcssfz/zcgh/201908/t20190816_1145788.html。

② 参见[德]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9—20 页；[德]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50—52 页；[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6—30 页；[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42 页；François Perroux, “Note sur la notion de ‘pôle de croissance’, ” *Économie Appliquée*, Vol. 8, No. 1-2, 1955, p. 309。

（Center-Periphery Model）揭示了经济中心区与经济边缘区之间的等级性结构关系。[①] 另外一些学者关注了世界城市和城市群的“点—轴”开发理论和“区域双核”结构模式，[②] 发现交通干线、能源运输线路地区以及具有空间整合机会的城市通常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他们认为，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能促进产业集聚，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并产生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③] 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一个地区能否成为制造业中心，受制于经济规模、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份额。[④] 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吸引外资，形成电子产业集聚，[⑤] 中西部内陆地区则因区位劣势，无法有效对接全球生产网络。[⑥] 因此，沿海发达省份产业集聚“遍地开花”，而西部产业集聚则是在有限的几个城市“扎堆”。[⑦] 经济地理学解释了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的总体差异，但容易将区位聚集视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约束，对改变内陆区位经济意义的交通、技术和开放平台等因素关注不足，也难以解释内陆不同地区为何呈现出不同发展轨迹。

（二）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战略地位与国家能力

地缘政治经济学关注空间的战略价值和国家塑造经济联系网络的能力。它经历了从地缘政治学到地缘经济学的演变，主要解释为何特定地理空间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影响，以及经济体如何通过主导地理空间获得政治经济优势。

---

① John Friedman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p. 10-13.

② 参见陆大道：《二〇〇〇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地理科学》1986年第2期，第111页；陆玉麒：《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形成机理》，《地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85—95页。

③ Robert W. Helsley and William C. Strange, “Innovation and Input Shar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51, No. 1, 2002, p. 25; Marius Brülhart and Nicole A. Mathys,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8, No. 4, 2008, p. 348; Masahisa Fujita and Jacques-François Thisse, “Doe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Who Gains and Loses from It?”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2, 2003, p. 121.

④ Paul Krugman,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pp. 51-52.

⑤ C. Cindy Fan and Allen J. Scot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Spatial Economic Issues in East Asia 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egions,”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9, No. 3, 2003, p. 313.

⑥ 贺灿飞：《高级经济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10页。

⑦ 潘文卿、刘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41—142页。

地缘政治学认为，处于交通要道、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战略重要性，从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从大陆心脏说到边缘地带说，从陆权论到海权论、空权论乃至制天权论等，都认为内陆地区发展取决于其地理特征及战略地位。冷战后，地缘经济学关注国家如何运用贸易、资本和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进行竞争。[①] 市场逻辑取代了以国家领土与社会安全为基础的地缘政治逻辑，财富积累由市场规律主导完成。[②] 然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投射能力并不均衡，地缘经济禀赋决定了地缘经济工具的有效性。[③] 相较沿海地区，内陆因地形阻隔、远离海洋，经济贸易体制封闭，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科技创新进程滞后。[④] 因对过境通道邻国（transit neighbors）在基础设施、政治、安全与制度层面的多重依赖，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受到制约，居民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水平低于沿海地区，较少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⑤] 内陆地区可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和经济催化剂（如能源、物流和金融），[⑥] 加强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地缘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国家战略和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但对战略资源在地方层面的转化机制关注不足，因而难以解释处于相似交通区位或拥有类似资源禀赋的内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对于部分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地区，其发展反而不及一些未获支持地区的现象，地缘政治经济学亦缺乏有力解释。

（三）发展经济学视角：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困境

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资本扩张会导致维持生计部门（subsistence

①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1990, pp. 19-23.

② Deborah Cowen and Neil Smith,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Antipode,* Vol. 41, No. 1, 2009, pp. 42-43.

③ Robert D. Blackwill and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7-28.

④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 38.

⑤ 参见 Michael L. Faye et al., “The Challenges Facing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5, No. 1, 2004, p. 31；曹吉云、佟家栋：《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地理与社会政治因素》，《南开经济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36 页。

⑥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148-149; Kent E. Calder, *Super Continent: The Logic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1.

sector）的劳动者被吸纳到资本主义部门（capitalist sector），因而获得不同规模投资的领域呈现不同的发展状况。[①] 在此过程中，资源能否有效转化为资本并用于产业升级，尤为关键。作为发展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之一，“资源诅咒论”（Resource Curse）挑战了资源禀赋简单等同于发展优势的观点，强调资源丰裕未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福音，反而可能成为“诅咒”。从早期关于“荷兰病”现象的讨论到索洛增长理论（Solow Growth Model），再到大量实证研究，都指出资源丰富程度与经济增长并非呈线性正相关。[②] 在“资源诅咒”机制下，资源配置扭曲、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荷兰病、国家发展陷阱等问题层出不穷。[③] 自然资源的商品价格波动也对内陆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经常项目管制、不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种族冲突会加剧这种波动性。[④] 远离世界市场、没有发达邻国以及受“资源诅咒”的内陆地区发展出现落后态势。[⑤] 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也发现，资源禀赋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形成“资

① 在刘易斯的论述中，资本主义部门是指在经济中使用可再生产资本，并为此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部分，而维持生计部门是指在经济中未使用可再生产资本的所有部分，详见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 No. 2, 1954, pp. 146-148。

② 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1956, pp. 70-71; “资源诅咒”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是高价格经济体）较自然资源贫乏国家经济增速更低，并且难以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参见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 827; W. M. Corden, “Booming Sector and Dutch Disease Economics: Survey and Consolid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36, No. 3, 1984, pp. 359-380。

③ 参见 Michael 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3, 2001, pp. 356-357; Thorvaldur 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 858;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The Big Push, 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9, No. 1, 1999, p. 48; Giles Atkinson and Kirk Hamilton, “Savings, 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1, No. 11, 2003, p. 1804;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7, pp. 11-12;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56-258。

④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d Steven Poelhekke, “Volatilit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61, No. 4, 2009, p. 754.

⑤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orld Bank, 2009, p. 272,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entities/publication/58557d74-baf0-5f97-a255-00482909810a.

源诅咒”效应。[①] 这一视角能够部分解释内陆地区的经济困境，但对一些资源丰富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的解释力偏弱。资源是影响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因素。发展困境并非缘于资源本身，而在于资源如何与所处的生态体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互动。

上述三种视角揭示了区位、战略和资源对内陆的影响，但任何单一视角都难以解释这些因素之间的联动以及影响。区位的经济意义会随着交通、技术、开放网络以及全球生产体系而改变，战略性资源产生的实际效应也取决于资源配置机制、地方自主性和开放制度。总体来看，对内陆地区发展的既有研究始终囿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发展框架，忽视了内陆地区发展与更大范围内生态体系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内陆地区发展是全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影响因素除了国家及其互动构成的国际体系外，还有人与自然互动构成的生态体系。因此，本文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将内陆地区发展置于生态体系的宏观视野中，构建基于开放型生态体系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全球共同发展问题，并以 1949 年以来重庆地区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为案例进行实证检验，探寻内陆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之道。

二、生态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内陆地区现代化

本文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陆地区实践的理论逻辑，解释内陆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和生态密码。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也是对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实证检验，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制度主义的核心变量：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

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是探讨政治秩序如何产生的学理路径，它旨在回答决定地区秩序的制度条件和生态因素，其核心变量是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以生态条件为基础筛选特定制度属性，当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经济增速下滑、产业多样化不足、发展受限时，以制度属性为路径塑造政治秩序。在内陆地区发展语境下，本文对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作以下操作化界定。

① 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58—159 页。

第一，“生态”是指一个地区在特定时空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要素禀赋、人地关系等各类发展条件的总量，反映一个地区与其他行为体相关联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地位。生态条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估。首先，自然地理与交通区位条件是区分内陆与沿海最基础的维度，即发展的“底子”是什么。一个地区距离海岸线、交通节点以及国内主要消费市场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成本决定该地区能否便利地使用海运、陆运及多式联运。其次，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该地区的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即发展往哪里走。一个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丰裕度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价关系，影响着该地区重点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最后，嵌入区域与全球经济网络的程度可衡量地区间分工的协同程度，即发展能走多远。一个地区与外部经济体在投资、技术与贸易方面的关联程度，表明该地区是嵌入还是游离于地区或国际分工体系。三个维度在特定时空下的综合状态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态条件。生态条件的开放或封闭并非静态、二元对立的，而是随着基础设施完善、技术革新以及国内外经济格局变迁而动态转换。

第二，“制度”是指国家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本文按照资源配置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制度具有整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两种特征。这一区分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资源配置主导机制的提炼。[①] 内陆地区的制度属性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估。首先，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是区分整体本位与个体本位最核心的制度维度。一个地区的关键生产要素主要按行政计划调配还是由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决定人财物的流向。其次，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决定地方能否根据自身生态条件灵活调整发展策略。在央地关系中，地方政府具有多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与该地区在财政收支、投资审批以及产业规划等地方经济事务的自主管理空间紧密相关。最后，对外经贸制度的开放度反映内陆地区对融入外部市场的制度支撑度。一个地区在外

① “整体本位”与“个体本位”是描述资源配置机制相对权重变化的分析性概念。在本文语境下，即便在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个体本位”在本文中仅指在资源配置的具体操作层面，即市场机制、地方自主权和对外开放制度的相对权重有所上升。在中国的实践中，这两种制度属性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存并发挥协同作用。

资引进与准入、开放平台建设（如保税区、国家级新区、国际物流通道等）等方面的政策力度，影响该地区的对外合作水平。当行政计划调配发挥资源配置主要作用、地方经济自主权有限且对外经贸制度相对封闭时，制度属性呈现整体本位特征；当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主要作用、地方经济决策自主权较大且对外经贸制度趋于开放时，制度属性表现出个体本位特征。与生态条件相似，制度属性同样也因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而转换。

基于上述变量操作化界定，可从生态与制度两方面描述内陆地区的一般性特征。从生态条件维度来看，内陆地区运输成本较高，要素流动受地理阻隔而成本偏高，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嵌入地区或全球经济网络的起点较低，这使得内陆地区在发展初期普遍受到封闭生态条件约束。从制度属性维度来看，内陆地区历史上大多依赖国家战略进行资源调拨，获得充分的发展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时间也通常落后于沿海地区，对外经贸制度建设也相对较晚，因此，内陆地区参与经济治理的能力普遍较弱。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的双维度约束，构成了内陆地区发展的起始条件，也成为本研究的理论探讨起点。

（二）内陆地区现代化战略的四种路径

内陆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内陆泛指远离海洋且具有五百公里纵深的地区。近代以来，关于内陆地区，学界并未形成共识，存在着“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等众多表述，[①] 大致涵盖了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②] 本文将内陆地区界

①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首次将“中亚”界定为北纬 44.5°以北 5°至以南 5°的地区，即“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此后，“中亚”概念在学界得到广泛探讨，其地理范围与历史范围有一致性。参见[巴]A.H.丹尼、[俄]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 1 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366—368 页；[美]丹尼斯·赛诺：《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20 页；[美]费正清、[美]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5—36 页。

② 比如，拉铁摩尔从经济发展视角出发，将没有海岸线的亚洲地区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新清史”研究的学者则更多从政治文化角度将内陆地区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政治、文化单元，参见 James A. Millward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 3-4；刘文鹏：《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2015 年 5 月 13 日，http://jds.cssn.cn/newzxdt/202101/t20210128_5301206.shtml。

定为：不能享受沿边海运和陆运交通之利，且不能善用海运和陆运交通之利的地区。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内陆地区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是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的地理依托。早期的现代地缘政治学认为内陆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取得海洋优势，中国具有毗邻欧亚大陆的天然优势。[①] 随着经济发展重心向沿海和沿边地区倾斜，原本作为帝国封疆建国之战略前哨的内陆地区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腹地，近代以前的地缘政治学逻辑逐渐被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所取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决定内陆地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内陆地区的发展属于国家与市场共同建构的政治经济范畴。由于缺乏海洋交通，内陆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市场和国家战略。就资源而言，内陆地区通常依赖如矿产等自然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就市场而言，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依赖外部市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贸易和物流网络；就国家战略而言，内陆地区发展依赖国家在法律、战略、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上给予的特定倾斜。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我们都不应局限于内陆与沿海、国内与国际的简单二分法。事实上，内陆地区与非内陆地区都处于同一个生态体系之中，有着共同价值与利益，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变革以及一系列外部问题的涌现，内陆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文所述，内陆地区的发展是其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交互作用的产物。根据生态条件（开放/封闭）与制度属性（整体本位/个体本位）的双变量影响，内陆地区的现代化战略呈现出四种形态（见表 1）。在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看来，生态选择制度，制度创造秩序。[②] 不同的生态条件与不同属性的制度进行互动，从而在特定时空中形成特定的政治秩序。

---

① 根据科恩的区分，现代地缘政治学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政权争夺霸权、德国地缘政治学、美国地缘政治学、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代。详见[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 2 版），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33 页。

② 赵可金：《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84 页。

表 1　内陆地区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决定因素

生态条件 / 制度属性	封闭条件（本土/全球）	开放条件（本土/全球）
整体本位特征（市场/国家）	防御型战略（Defensive） 案例检验：三线建设	进取型战略（Progressive） 案例检验：西部大开发
个体本位特征（市场/国家）	追随型战略（Adaptive） 案例检验：计划单列、重庆直辖	开拓型战略（Pioneering） 案例检验：西部陆海新通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当一国之内陆地区的生态条件为封闭状态，且制度属性总体上呈现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特征，该内陆地区则倾向于采取防御型战略，其发展更多以国家战略为主。在这一时空阶段，内陆地区因存在比较劣势而选择封闭生态。封闭生态的低开放度意味着资源总量和交互有限，资源供求关系紧张，且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制度通过战略规划、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工具对封闭体系资源作行政划分。内陆地区采用强政治属性的防御型战略，其完全依赖封闭生态体系中的计划资源配给、调拨与给定策略，拥有的比较优势不足，总体处于被动接受的生态位。本文选取以国家安全防御使命为主的重庆三线建设作为防御型战略的检验案例。

第二，当一国之内陆地区的生态条件维持封闭状态，且制度属性总体上呈现市场主导的个体本位特征，该内陆地区则倾向于采取追随型战略，其发展以有限制的市场竞争为主。在这一时空阶段，内陆地区存在比较劣势的情况并未显著改变，但原有封闭生态下国家主导的资源配置效率已临近增长极限并且无法有效缓解紧张的资源供需关系，生态条件出现变化迹象但仍保持封闭。该内陆地区因而选择市场机制采取更灵活和符合市场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并调整比较优势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开放生态。这一追随型现代化战略是内陆地区在封闭生态下偏好市场效率且为开放生态进行预适应的选择，其资源配置方式从国家完全主导转向遵循市场规律，内陆地区总体处于

主动适配的生态位。本文选取被赋予更大经济决策自主权的重庆计划单列市和重庆直辖作为追随型战略的检验案例。

第三，当一国之内陆地区的生态条件为开放状态，且制度属性总体上呈现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特征，该内陆地区则倾向于采取进取型战略，其发展更多服从于开放生态下的国家主导战略。在这一时空阶段，内陆地区比较优势明显，从封闭生态转向开放生态。开放生态的高开放度增进了内外资源交互并提高了生态位资源上限，资源供求紧张关系虽然明显缓解，但资源供求关系仍然失衡，即封闭生态向开放生态的转轨面临发展不确定性。内陆地区因而选择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制度，通过对接国家战略与规划进行资源配置，其现代化战略是开放生态下国家引导资源配置的进取型战略。开放生态条件与整体本位制度下的进取型战略，旨在依靠国家对开放生态资源的集中统筹与制度化引导，内陆地区在这一战略引领下发展比较优势，处于积极调整的生态位。本文选取西部大开发这一引领内陆地区进行战略开放的国家顶层设计作为检验案例。

第四，当一国之内陆地区的生态条件为开放状态，且制度属性总体上呈现市场主导的个体本位特征，该内陆地区则倾向于采取开拓型战略，其发展更多服从于全面的市场竞争战略。在这一时空阶段，内陆地区在高度开放生态中发展、调整和探索比较优势，维持开放生态能为其扩大比较优势提供支持。但是，在这一生态条件下，国家主导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所不足，需要采取市场主导的制度来自下而上调动内陆地区的积极性，开展市场竞争，并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这一时期的内陆地区现代化战略是开放生态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开拓型战略。开放生态条件与个体本位制度特征下的开拓型战略，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内陆地区在开放生态中全面参与竞争，处于积极有为的生态位。本文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的内陆地区战略作为检验案例。

内陆地区现代化战略的四种形态是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交织下，在特定时空内生成的特定政治秩序。内陆地区生态条件的开放程度决定生态位的资源上限，并影响治理制度的选择逻辑，最终形成不同的政治秩序。这些现代

化战略反映了内陆地区层层递进的发展逻辑：防御型—追随型—进取型—开拓型，反映不同生态资源总量与资源供求关系下政治秩序的自我调适与迭代。整体生态的开放度切换与单一生态下的治理制度调整，是内陆地区在特定时空中跨越“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之举。这使新的政治秩序既贴合资源配置，又符合生态体系整体开放度，从而在一定时空内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在此过程中，内陆地区的比较优势从无到有，由弱转强，再到进一步探索，内陆地区的生态位同时也经历了被动接受、主动适配、积极调整到积极有为的过程，整个地区从封闭生态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开放生态的主动塑造者。这便是生态制度主义视角下内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逻辑。

三、实证检验：1949 年以来的重庆现代化战略

重庆是中国近代以来内陆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的缩影。它在生态条件上经历了封闭到开埠通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发展过程。[①] 在制度属性上，它经历了战时首都、内陆省辖市、中央直辖市等制度形态变化。新时代的重庆成为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地区经济中心。[②] 自 1949 年以来，受特定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影响，重庆在现代化战略上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见表 2）。

① 例如，根据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智库的报告，在 2024 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中，重庆进入全球 Beta 级城市序列，处于内陆地区前列，并超过一众沿海城市。参见 *World Cities 2024*, GaWC, 2023, https://gawc.lboro.ac.uk/gawc-worlds/the-world-according-to-gawc/world-cities-2024/。

② 国务院关于《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指出，重庆要发挥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西部科技创新中心和对外开放门户、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等功能，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与周边省市功能互补联动，协同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抓手，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参见《国务院关于〈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中国政府网，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2/content_6934302.htm；《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好运营好》，新华网，2025 年 5 月 24 日，http://www.news.cn/20250524/996256c3d3ba4363b448f1ac1257cf44/c.html。

表 2　重庆市现代化战略的生态条件与制度属性（1949—2026 年）

观测维度 \ 发展战略	防御型（1949—1979 年）	追随型（1979—1999 年）	进取型（1999—2019 年）	开拓型（2019—2026 年）
生态条件				
交通区位	深居腹地，无独立对外通道	国内通道渐开，对外运输劣势未根本改变	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长江水道升级，区位显著改善	陆海新通道直达多国多港，基本突破区位约束
要素禀赋	依托三线建设形成重工军产体系，无比较优势	三线遗留工业转型，竞争力培育中	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优势显现，电子产业集群形成	产业链配套趋于完整，从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网络嵌入	脱嵌于全球分工体系	国内市场联系增强，未与国际市场实质对接	入世后融入全球供应链，利用外资规模大幅增长	运输货物逾千种，深度嵌入全球网络
生态条件	封闭	封闭（松动）	开放	开放（深化）
制度属性				
资源配置机制	计划经济，国家统一调配	计划向市场转轨，市场作用有限	国家主导投资拉动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地方经济自主权	省辖市，无自主决策权	计划单列获省级管理权，直辖扩大自主权	直辖市体制下主动争取开放平台	主动推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外制度开放度	无对外开放安排	对外开放起步，缺乏专门平台	建成 19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	陆海新通道纳入国家战略，推进制度型开放
制度属性特征	整体本位特征	个体本位特征（初步）	整体本位特征（开放）	个体本位特征（成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防御型战略的艰难探索：以三线建设为例（1949—1979 年）

1949—1979 年，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缺乏对外联系通道，生态条件为封闭状态。当时的三线建设选址贯彻“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①] 与外界

① 三线建设是指 1964 年至 1980 年期间，中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国防和工业建设，主要目的是为了备战备荒、建立战略后方基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

高度隔离。在制度属性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作为省辖市的重庆的生产要素需完全服从国家计划调配，这使其游离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此外，国家承受着美苏冷战的国际安全压力，内陆地区肩负着在西南地区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1956 年，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①]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下，封闭的生态条件与整体本位制度叠加，重庆在这一阶段采取了防御型战略。

1949—1963 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成为主要任务，[②] 服务于新生政权的工业建设。[③] 1964 年 5 月，毛泽东要求全党重视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④] 周恩来也强调一、二线与第三线之间的布局关系。[⑤] 8 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要防范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各省要建立战略后方，党中央正式作出三线建设这一战略决策。10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强调在重庆建立武器和机械制造基地。[⑥] 1965 年 9 月，国家计委在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提纲中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首位，推进三线建设。[⑦] 同年，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作为西南工业重镇，重庆衔接大三线建设的工业综合配套能力强，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⑧]

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 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4 页。

② 吴家农、马述林：《重庆工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36 页。

③ 整个“一五”时期，重庆投资以大型工业项目为导向，工农业产值年均递增 12.2%，高于全国 10.9%的平均增长率，重庆继续发挥西南经济中心作用，详见孙同川主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版，第 16 页。

④ 李新芝、郑俊明主编：《毛泽东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6 页。

⑤ 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 页。

⑥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版，第 55、67 页。

⑦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8—529 页。

⑧ 按照建设规模和地理布局，三线建设可划分为小三线与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特指全国沿海沿边地区自筹资金进行腹地工业建设的“经济建设战略”，大三线建设特指在西南和西北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详见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开放世界》2018 年第 2 期，第 69 页。

在这一阶段，重庆以整体本位制度接受封闭生态中的资源调配，[①] 实现经济恢复与战备工业建设的突破。三线建设也为重庆发展赢得了机遇，大规模资源的跨区域集中划拨推动了当地工业体系发展，奠定了重庆作为国家战略后方的地位。防御型战略是战略安全考量高于一切的时代产物。

（二）追随型战略的渐进探索：以行政体制调整为例（1979—1999 年）

改革开放后，重庆所处的封闭生态出现松动迹象，但并未根本改变。重庆与国内大市场的联系通道逐步打开，但未与国际市场形成实质对接。三线建设遗留工业进入调整转型期，要素竞争力尚在培育之中。在制度层面，中央批准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与设立中央直辖市，为重庆带来了行政上的灵活性，资源配置开始从计划调配向市场机制过渡。在封闭生态尚未破局的条件下，追随型战略成为选择。

改革开放推动各地区发展由为国内计划经济服务过渡到适应并为国内市场经济服务，重庆的生态开放度有所改善。计划单列和中央直辖双举措赋予重庆更加自主的经济管理权，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重庆开始培育并调整自身比较优势。1983 年，中央批准在重庆率先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开发西南经济。[②] 1984 年，重庆实行第三次计划单列，获得了与自身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有利于提高其与封闭生态的适配性。同年，三线建设方针调整，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化。[③] 1997 年，重庆成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为生产创新提供了制度便利。地处西部资源富集区与东部经济高地的交汇枢纽，直辖能够充分发挥重庆对西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双重辐射功能。[④]

---

① 例如，1964 年至 1980 年，重庆市基本建设投资增速呈现剧烈波动，详见吴家农、马述林：《重庆工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10 页。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汇编》，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98 页。

③ 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108 页。

④ 参见孟广涵主编：《设立重庆直辖市纪实》，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此后，部分重庆国有企业因对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准备不足而陷入困境。对此，重庆实施“七个一批”专项任务进行国企改革，并配合中央推动企业脱困与转型，同市场主导的制度条件接轨。参见吴家农、马述林：《重庆工业简史》，第 285 页；李维平等：《直辖三年看重庆》，《人民日报》2000 年 7 月 9 日，第 4 版；张银平：《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2 页；《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

（三）进取型战略的重要实践：以西部大开发为例（1999—2019 年）

进入 21 世纪，重庆生态条件由封闭转向开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中欧班列（渝新欧）全线贯通与长江黄金水道升级，重庆的生态开放度得到极大提升，中国“入世”后实际利用外资也大幅增加。这一时期的资源配置是以西部大开发为标志的国家主导投资拉动为主。开放的生态条件与整体本位的制度引导相结合，重庆采取了进取型战略。

1988 年，邓小平关于沿海和内地辩证发展的“两个大局”的谈话指出，沿海地区需要反哺内地发展。[①] 1999 年，江泽民在全国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②] 同年，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号召。[③]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④] 面对这一机遇，重庆一方面凭借国家战略吸引国内外资本大规模流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的“十五”期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九五”时期的 2.78 倍，固定资产投资对重庆经济的贡献率由 1996 年的 29.1%增长到 2005 年的 101.8%。[⑤] “十一五”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 1950 年到“十五”结束期间投资总和的两倍，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与进出口差额激增。[⑥] 另一方面，重庆以对外开放平台打造开放型经济，适应开放生态中的市场规律，努力培育并调整自身比较优势。《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将“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强调打破行政局限与市场分割，支持东西部生产要素跨

目标基本实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01 年 1 月 9 日，http://www.scio.gov.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2001n_13621/2001n01y09r/202207/t20220715_158539.html。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7—278 页。

② 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8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六十年珍贵档案》（下），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45—1547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⑤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重庆市统计局网站，2019 年 5 月 29 日，https://tjj.cq.gov.cn/zwgk_233/fdzdgknr/tjxx/sjjd_55469/202002/t20200219_5273775.html。

⑥ 参见吴家农、马述林：《重庆工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89 页；关于实际利用外资额度和进出口差额数据，参见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编：《重庆统计年鉴 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60—461 页。

区域、跨行业以及跨所有制充分流动，形成东中西部协同发展格局。[①] 在现代化潜力有待充分释放的情况下，重庆争取到内陆地区首个“水港+空港”双功能保税港区、首个综合保税区以及首个国家级新区。[②] 截至 2019 年，重庆共有 19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涉及开发开放新区、海关监管、国际联运物流等领域，为整体本位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③]

进取型战略借助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入世”机遇，推动以公共投资及园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使重庆从直辖初期“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叠加（即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单一问题与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并存）”的欠发达地区，跃升为中国西部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引擎。

（四）开拓型战略的创新实践：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例（2019 年至今）

2019 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直达全球多个交通枢纽，重庆深度嵌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开放生态进一步深化。制度层面转型趋于成熟，非公经济比重进一步提升，经济决策自主权与战略规划能力显著增强。在开放生态深化与个体本位特征成熟的背景下，开拓型战略成为可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两个战略判断相结合，塑造了中国所处的新发展时代特征。重庆也开启了新的现代化征程，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这一战略谋划的产物。西部陆海新通道是重庆市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探索。面临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压力，重庆决定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2019 年，陆海新通道正式成为国家战略，[④] 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供

①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07 年，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0709/P020191104623124380472.pdf。

② 参见《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基本情况》，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网站，2026 年 3 月 13 日，http://www.ccfta.com/content/2026-03/13/content_10000044.htm；《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2024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cq.gov.cn/zt/yhyshj/zsyz/zspt/zhq/202409/t20240923_13651520.html；2011 年，国务院明确指出两江新区应建设成为内陆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键基地、长江上游金融与创新中心，以及面向外部开放的重要门户与科学发展示范区，详见《国务院关于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国政府网，2011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77831.htm。

③ 《不沿边不靠海　内陆重庆跻身开放前沿》，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网站，2019 年 9 月 18 日，http://www.ccfta.com/content/2019-09/18/content_10003073.htm。

④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19 年 8 月 2 日，https://www.mct.gov.cn/preview/whhlyqyzcxxfw/zhgl/202012/t20201226

了坚实的制度支点。作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的核心是激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潜力，[①] 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以使生产要素顺畅流动。[②]

在打造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引领下，重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比较优势并塑造自身生态位，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更全面的市场竞争。陆海新通道成为地区发展、国家战略与贸易物流的重要通道，意味着重庆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两个维度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③] 双城经济圈与陆海新通道的配合，进一步加强了重庆与西部地区的互联互通，强调市场在要素优化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快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同时接入国际市场，为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

四、内陆地区现代化战略的理论启示

重庆 70 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内陆地区每一个阶段的现代化战略都受到特定生态条件和制度属性的影响，这些现代化战略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其历史经验是，中国内陆地区总是通过实施比上个阶段更大力度的开放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难题，通过开放竞争来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在封闭生态条件下，内陆地区由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制度特征向市场主导的个

_920117.html。

① 2015 年至 2019 年，中央对重庆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保持较高增速，2020 年起增速有所下降，参见《中央政府预决算》，财政部网站，https://www.mof.gov.cn/zyyjsgkpt/zyzfyjs/。

② 2023 年，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的总箱量与货值分别同比增长 21%和 16%。参见《一定把陆海新通道建设好运营好》，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2024 年 4 月 25 日，https://cq.gov.cn/zt/xblhxtd/rdxw/202404/t20240425_13156385.html；此外，截至 2025 年 1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货物品类逾千种，覆盖国内 18 个省、73 座城市和 157 个物流节点，直达全球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555 个港口枢纽，参见《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 127 个地方和地区》，新华网，2025 年 1 月 16 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116/4768d2665479465c9f399e 052249b3bf/c.html。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

体本位制度特征侧重，开展有限的国内市场竞争，并未与国际市场接轨，存在一定的比较劣势。对此，内陆地区尝试从被动接受的生态位转向主动适配的生态位，提高自身资源要素与封闭生态体系的匹配度，并开始培育、调整自身比较优势。在开放生态下，内陆地区由国家主导的整体本位制度特征转为由市场主导的个体本位制度特征，与国际市场接轨，开展全方位的市场竞争。在此过程中，内陆地区尝试从开放生态中因转型试错所处的积极调整生态位，转向主动塑造开放生态体系，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见图 1）

图 1　一国在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生态位与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制度属性决定内陆的发展速度，生态条件则决定内陆的发展高度，制度与生态相辅相成。1949 年以来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单一生态下由整体本位制度转向个体本位制度；二是生态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制度属性方面，整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推动内陆地区资源整合由块状推进走向点状突破，先由国家整体战略引领来实现较容易的目标（low-hanging fruit），而后由内陆地区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单一生态下的资源整合，根据市

场需求培育比较优势，同时因需付出试错成本而使发展速度存在不确定性。在生态条件方面，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市场的内在需求。国内单一区域市场已无法满足内陆经济发展的需要，内陆地区需要接入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换言之，制度对单一生态内资源整合效率具有巨大影响，生态条件决定内陆发展是处于封闭体系内的零星整合还是与开放生态进行交互。内陆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既需要制度调整的速度，也需要生态发展的高度，更需要二者之间的平衡。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强调依赖结构调整的制度主义理论对生态条件不理想的内陆地区发展的解释力有限，对同样存在生态条件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解释力也不足。

本文认为，内陆地区现代化是有规律可循、有路径可依的。内陆地区一般具有先天的封闭生态条件，且无论资源禀赋过多或过少都会产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其本质是缺乏对比较优势的激发与探索，即对“发展—生态—制度”三者缺少顶层设计和连贯规划。因此，内陆地区发展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国家引领完成封闭生态中的内陆资源整合，二是通过个体本位补位实现封闭生态中的内陆地区优势建构，三是国家再次引领内陆地区在开放生态中的比较优势调整，四是内陆地区利用个体本位的市场机制主动探索比较优势。如图 1 所示，内陆地区现代化发展轨迹依次为第三、第四、第二、第一象限。这一路径可为不同内陆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

当代内陆地区现代化的方向是在开放生态下既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调控作用。开放生态代表国内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内陆具有更广阔市场与更多资源渠道。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型开放，激发内陆地区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①] 本文提出的生态制度主义的内陆政治经济学正是对内陆地区依据时空和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①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网，2023 年 9 月 30 日，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9/30/c_1129890528.htm。

结　语

内陆地区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即资源优势和开放劣势。如何扬长避短，实现内陆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内陆地区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生态优化和制度创新的相互调适，前者意味着改善内陆地区发展的资源总量约束条件，后者意味着进一步激活和释放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活力，内陆地区现代化必须在优化生态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改革制度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宝贵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内陆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要点在于突破生态瓶颈，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接国际市场，并在开放生态中通过制度创新拓展制度型开放的新发展空间，积极塑造自身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陆地区的实践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欧美发达国家提出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陆地区的实践更重视以国情和区情为中心，强调从调适生态条件与制度类型的关系来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内陆地区来说，从被动接受的生态位到主动有为的生态位，从存在比较劣势到塑造比较优势，在开放生态体系下全方位市场竞争中释放发展能量，从个体本位制度中寻找新的发展活力，这是内陆地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与生态位转型跃升的必由之路。毫无疑问，这一内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张　珺]